

宋江——程朱理学的黑样板

哲学系大批判组

两宋时期，我国封建社会已走上了下坡路，农民革命不断高涨。赵宋王朝用军事围剿和政治招降的反革命两手来对付农民革命运动。适应这一反动政治需要，程颢、程颐、朱熹等一伙孔孟之徒，以天命论为理论基础，以“忠孝节义”的封建宗法思想为政治内容，建立了精巧圆滑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大肆宣扬“君臣父子之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封建奴化思想，为瓦解人民革命斗志、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提供反动思想武器。

为了用理学的神药麻醉更多的人民群众，一批尊孔崇儒的反动文人，把哲学讲坛上的“君臣父子之理”搬上文艺舞台，导演了一幕幕“臣死忠”、“子死孝”、“妻死节”、“仆死义”的反动丑剧，狂热鼓吹向封建统治阶级和统治思想投降的奴才哲学；而《水浒》则是把精巧的艺术形式和反动的理学内容结合起来，用来宣扬奴化思想和投降哲学的绝好的反面教材。

《水浒》中的宋江是用程朱理学塑造出来的一个“忠义双全”的黑样板。他“自幼学儒，长而通吏”，很会玩弄一套运用理学教义来“防民诱民”的“权谋”，在“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似一伙”的农民起义高潮中，他假仁假义，伪装成农民之友；混进革命队伍后，打着“替天行道”的黑旗，兜售“顺天”、“护国”、“保义”的理学教条，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大造反动舆论。解剖这个黑样板，揭露他鼓吹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依据，可以看出程朱理学的反动实质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反动作用，从而使我们看清一切钻进革命阵营来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叛徒、内奸其所以狂热地鼓吹孔孟程朱之道的阴险用心。

“顺天”——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

唯心主义的天理论是天命论的变种，是在农民革命高涨时期理学家们用来为反动封建统治作辩护的理论依据。《水浒》作者就是根据这种天理论来塑造宋江这

个投降派典型，为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服务的。

在封建社会中，“冲天”和“顺天”，代表农民革命运动中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两宋时期的农民起义，继承“冲天”的革命传统，公开宣布“等贵贱，均贫富”的农民革命纲领是“天理当然”的“善法”，把赵宋王朝维护“贵贱贫富”差别的封建“国典”斥为“岂有此理”的“邪法”，决心要用暴力手段来灭地主阶级之“法”，行农民阶级之“法”。这对反动天命论所维护的封建“王法”，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理学创始人程颢为了论证封建统治者用“国典”统治人民是“确有此理”，便对儒家传统的天命论进行了理论加工，终于“体贴出”“天理”二字，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为论证封建统治的“合理性”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更狂妄地宣称：“亘古亘今，只此一理”，妄图用地主阶级反动的天理论来对抗农民革命运动，把打得奄奄待毙的封建“死法”复活过来。《水浒》中的宋江，正是在农民“冲天”天欲塌，地主呼天天不应的情况下，作为地主阶级的护法“星主”，捧着程朱理学的天理论，从天上来到了人间。

《水浒》作者根据天理论中的“天赋受命”说，让“九天玄女”授“天书”、传“法旨”，把地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授予来到了人间的“星主”宋江：“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这几句“法旨”，告诫宋江在农民起义的惊涛骇浪中，无论是“把寨为头”还是“在朝为臣”，都要帮助主子大行孔孟之道，“去”农民革命之“邪”，“归”封建法统之“正”，做地主阶级的“忠臣义士”。“玄女”口授的“法旨”，其理论基础就是反动的天理论。朱熹说：“天即理”，“天命”就是“天所赋之正理”。在他看来，地主阶级奴役劳动人民，正如人跨在马上一样，不仅是“命该如此”，而且是“理所当然”；相反，劳动人民不愿作牛马，起来造反，那就是“翻天”、“逆理”，为地主阶级的“天理”所不容了。《水浒》作者就是用这种反动的天理论来武装宋江，要他在今后的反革命生涯中，“勿生退悔”，做一个顽固的“顺天”派，去扑灭农民起义的“冲天”革命怒火。

“顺天”与“冲天”的斗争，反映在反动理学家头脑里便是所谓“天理人欲”之争。朱熹胡说什么“合道理的是天理”，“徇情欲的是人欲”，攻击农民争取人身平等和财产平均的革命要求是不合地主阶级之“理”的“人欲”，惊呼劳动农民的“人心”对于地主阶级的统治太危险了；如不加以防止，则“危者愈危”，不可收拾；因此，要象“知县”高居衙门一样，用地主阶级的“天理”去看管“人欲”，免得闹到“人欲横流”，淹死了地主阶级。做过押司、深通吏道的宋江，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套反动谬论深有体会。他念念不忘一个“顺”字，时刻警惕一个“反”字。他之恨“反心”正如朱熹之恨“人欲”一样，怕的是“反心未除”的农民革命派会把赵宋王朝的江山冲垮冲毁。所以他不管是混迹江湖，还是进身廊庙，都要祭起程朱理学“顺天、存理”这个法宝，去扑灭农民革命的“冲天”怒火，干他“忠君护国”的

反革命勾当。

“护国”——程朱理学的政治核心

程朱理学是用唯心主义天理论为封建皇权作辩护的反动哲学。天理、天理，主要讲的是“君臣之理”；天道、天道，主要讲的是“王者之道”；太极、太极，主要讲的是象征封建皇权的“皇极”。所有这些被理学家们谈得玄之又玄的最高哲学范畴，都不过是为了给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戴上一顶“万善至好”的哲学桂冠，在臣民面前树立一个不可触犯的神圣偶像，把“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精神枷锁套在人们的脖子上，“唯王者之命是听”，永生永世地当奴隶。这就是程朱理学的反动实质。

宋江就是一个满脑袋塞满了“君臣之理”的理学信徒和封建奴才。他打着“顺天护国”的黑旗，尊天子为“至圣至明”，自认“死罪死罪”，誓死“尽忠尽忠”。在他一生的反革命活动中，贯串着一条忠君护国、以理杀人的黑线。

在他未上梁山前，农民起义的革命烽火到处燃烧。以李逵、阮氏兄弟为代表的农民革命派，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撞破天罗，掀开地网”，“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他们对准吃人的封建“法度”和帝子神孙，抡起板斧就砍，拿起刀子就戳。对这种“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的革命造反精神，宋江恨之入骨。他打起程朱理学的官腔，摆出押司断狱的架势，判定农民起义的革命行动是“上逆天理”，犯了“于法度上却饶不得”的“迷天大罪”。这与朱熹“逆理则获罪于天”的反动叫嚣，简直是一个腔调。以后他“误犯刑典”，弄得快要杀头了，他也死抱住程颢所谓“天理如此，岂可逆哉！”的奴才哲学不放，宁为赵宋王朝的阶下囚，披枷戴锁去死，决不敢触动封建“王法”的半根毫毛。直到最后，他还无耻表白：“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这种被理学家们盛赞为最高“美德”的“勇于从而顺命”、“无所逃而待烹”的奴才精神，宋江身体力行，可说是为程朱理学的“忠君”思想树立了一个活样板。

由于形势所迫，宋江带着满脑袋的“忠君”思想混进了梁山农民起义队伍。这以李逵、阮氏兄弟为代表的革命派，在起义领袖晁盖“竭力同心，共聚大义”这一革命路线的鼓舞下，敢于“托胆称王”，立志“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准备通过武装斗争，“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由晁盖哥哥“做大皇帝”，建立农民革命政权。梁山农民军杀向赵宋王朝的革命锋芒，如利剑穿心，刺进了程朱理学的核心——那个作为理学最高范畴的“皇极”。宋江感到心痛了，便捧起理学的“忠字经”，誓死“保皇”。理学家们把“臣事君以忠”看成是“理之当然”，鼓吹“臣决定是合当忠”；

不忠，就是“无礼”、“非理”。宋江就根据这个原则在梁山干起“克己复礼”的勾当来了。他在篡夺领导权后，“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扯起“替天行道”的保皇旗，公然“以忠义为名”，用理学家“忠君护国”的反动路线来修正晁盖“聚众起义”的革命路线，改变梁山农民军的革命方向。对起义军众头领，他挥舞“忠义”这根大棒子，不准攻打州府，不准镇压敢于前来“征剿”的反动官兵，不准反对他乞求招安的投降活动。否则，就拿出理学尺度一量，以破坏“忠义自守”原则论罪，“斩首割舌有理”了。对于擒拿的官军俘虏，他又以奴才自居，捧出“忠义”这块招牌，表示对朝廷“毫无半点异心”，叩头请罪之后，按封建制度规定的身分等级地位，“扶上正座”，分别委以重任，相约“同以忠义为主”，争取早日接受招安。就这样，他确实够得上朱熹所谓“尽己之谓忠”的奴才标准，怀着一颗无限忠于赵宋王朝的黑心，改堂名，排座次，树降旗，盼招安，打击革命派，拉拢反动派，把生气勃勃的梁山农民革命运动引向毁灭的邪路。

奴才一旦“改邪归正”，做了“国家臣子”，就要名正言顺地打起“忠义救国”的旗子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过去，为了忠于皇帝，怀着一颗“宽宥原谅”的“仁爱之心”，对前来“征剿”的官军“不许追杀”，对抓到的反动军官更是“亲解其缚”、“纳头便拜”，“设宴压惊”或“礼送下山”，做得何等“仁至义尽”；现在，同样为了忠于皇帝，就扛起理学家“天讨有罪”的王牌，骂敢于造反的方腊起义军为“草寇”“贼徒”，要举起血淋淋的屠刀“剖腹剜心”，“诛尽杀绝”，恨不得一口吃掉了。就这样宋江把程朱理学的“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真算学到家了，终于“功德圆满”，完成了理学的“正果”。

理学，理学，就是如此鲜血淋淋的以忠报主、以理杀人的反革命哲学。

“保义”——程朱理学的骗人手法

在农民起义的革命高潮中，程颢早就看出：“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

尽管宋江念破了“忠字经”，唱尽了“投降曲”，而富于革命造反精神的梁山起义军还是“反心未除”，“强气未灭”，怒火冲天。这使宋江在投降道路上碰到了“弯曲”，不那么得心应手。于是便使出程朱理学“惩忿窒欲”、息怒止愤的绝招，如朱熹等叫嚷的“渐民以仁，摩民以义”，充分玩弄起孔孟的“仁义”骗术。他披起“呼群保义”的画皮，对于“性直刚勇”的农民革命派，用“忠”字还压不住，便用“义”字来进行蒙骗。

南宋的广大贫苦农民，“苦于剥削久矣”；但是他们要起来反抗，却受到了

“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极大的绳索”的重重束缚；他们只有采取“结义”的方式，用同生共死，患难相助的兄弟情谊来互相鼓舞斗志，进行艰苦的斗争。方腊曾经号召：“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所以，“聚众起义”，便成了革命农民在反封建斗争中团结自己、组织群众的普遍形式。

农民起义的革命威力迫使宋江披上“呼群保义”的外衣来投机革命、破坏革命。你看他，满口“仁兄”、“贤弟”，叫得来何等亲热；人称“义郎”、“义士”，听起来又何等“负有清名”。但是，正是这个“保义郎”，在关心武松“兄弟前程”的美名下，兜售“撺掇（串连）投降”、破坏革命的奸计；在尊重晁哥哥为“山寨之主”的名义下，架空晁盖，抢夺实权；在举起友谊之杯向兄弟劝饮时，用“义”酒毒死了“反心未除”的李逵。这个理学信徒兼江湖骗子的“保义郎”，他所保的究竟是那家之“义”，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但是，“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

以李逵、阮氏兄弟为代表的农民革命派，是具有朴素的革命感情的“忠直汉子”，正是由于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未能彻底看清“兄弟情分”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下掩盖的庐山真面目，在反对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中，有时也被“结义兄弟”的“义”捆住了手足，蒙住了眼睛；及至识破了宋江的阴谋诡计，要抛开“哥哥”闹革命、重新杀向梁山时，也由于未能摆脱传统的封建宗法思想，被宋江口蜜腹剑所宣扬的“义气”所迷惑，以致“尽有反心，只碍哥哥一个”，而陷于被动境地。就这样，程朱一伙炮制的“相蒙相欺”的骗子哲学，成了宋江手中捆绑革命派、瓦解农民军的重要手段。

正如朱熹所供认的，“义”是“天理之所宜”，它是为地主阶级的“天理”、“国法”来尽义务的；只是它的反革命锋芒掩藏在“柔软底”“人情味”中，人们不易觉察出来；但等到锋芒毕露，便如“利刀横剑”一样，“着物即断”，鲜血淋漓了。

血的事实证明，宋江口中的“义”是一把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象李逵这样坚定的农民革命派，不曾被反动派明晃晃的钢刀绞杀，却被内奸劝进的“义”酒诱杀了。这充分暴露了程朱理学用“仁义道德”来绞杀革命的欺骗性和反动性。

现代的投降派与古代的投降派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刘少奇、林彪妄图从内部攻破革命堡垒，也把孔孟程朱之道作为他们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理论基础和骗人手法。解剖宋江这个反面教员，汲取梁山起义的历史教训，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要坚持革命路线，反对投降路线，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必须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彻底清算孔孟程朱之道，把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